

郑 绩 传 略

(1813—1874)

温 华 湛

郑绩，字纪常，号憨士，别署“梦香园叟”。广东省新会市双水镇桥美乡南兴里人，是郑氏家族的二十一世孙。清道光年间著名的书诗、画家。

郑绩少年时多才善辩，擅绘画兼习医术。及长，因屡试不第，遂绝意仕途，另谋出路。曾行医兼做生意。因商业上应酬，在广州东堤酒舫与当时广东巡抚洪宪的某幕客认识。巡抚病，遍请名医不愈，某幕客征得巡抚同意，遂请郑到巡抚处治病。郑诊断巡抚年老患伤寒症，过去的医生都用进补的办法，但结果反令病情加重。郑绩根据巡抚病情，决定用先行疏解，然后调理的办法。巡抚服药一剂之后便觉得病情有所好转，数日之后痊愈。为表感激，送了一块特大的匾额，挂在郑绩医馆门口，从此，郑绩医名鹊起，来求医者日多。巡抚府中的幕客，见巡抚与郑绩结交，亦争相攀结郑绩为朋党。当时，广州一些举人、进士及社会名流组织了一个“金花会”，在广州河南区金花庙（海幢寺公园附近），定期聚会举行吟诗、绘画、书法等活动。起初，郑绩只以一介白衣身份，没有资格参加。后来因巡抚推荐，幕客中有些人又是此会中人，因此得以加入“金花会”。郑绩在诗、书、画诸方面本已有一定水平，且极有天才，不久便成为“金花会”中标新立异的突出人物，受到该会会员的赏识和社会人士的赞许。

郑绩既知医术、工诗词，又善画山水、人物，著有绘画理论

著作《梦幻居画学简明》，是他创作实践的真切体会。书凡山水、人物、花卉、翎毛、兽畜五卷，论述详尽，见解明晰。《山水卷·总论》云：“凡有见闻也，必因其然而求其所以然，执其端而扩充之，乃为已有。”又强调“学山水固当体认家法，而形尤须考究……形象乃为画学入门之规矩”。要旨在提倡画不含糊，得先打素描基础，然后讲究各家技法而从物象的实际出发。在《人物卷》中则主张：“凡写故实须细思其人其事始末何如，身入其境，目击耳闻。一般写其人，不徒写其貌，要肖其品。”及论笔法，则阐明：“形象固分宾主，而用笔亦有宾主，特出为主，旁接为宾，主为重，宾宜轻；主须严谨，宾要悠扬；两者和洽，勿相拗抗也。”还具体指出：“用笔贵不动指以运腕引气，盖指一动则腕松而弗能行丹田之气矣，是以有轻佻浮躁之弊。可知有力由于有气，有气由于能运腕，欲能运腕则不动指是为秘诀。”郑绩所论，科学而实际，值得研究与发扬。

道光甲辰（公元 1844 年）冬，郑绩绘了一幅《金钱图》巨画（此画今保存于新会市双水镇府），画中有一个四方孔的大金钱，被形形色色的人物重重围绕着，俱形神兼备，焚欲表露无遗。画的上方有两阙题词：

“钱！钱！钱！命相连，黄童白叟口流涎。读什么书，参什么禅，屈膝低头望周全。得了十数又想百，一百到手复求千。聋瞽痴哑日奔波，士农工商夜无眠。舔铜臭，咬铜边，多般丑态庶称贤。山僧百炼舍利子，钱中说法互牵缠。”

钱，钱，钱，命相连，有钱四海皆兄弟，无钱骨肉也徒然。英雄钱尽归故里，妻不下衽欲绝弦；庸富施施娇妻妾，步步相随誇宿缘。无钱徒嗟经满腹，有钱能掣生杀权。将来训诂钱神论，此后文章悲失传。相争相夺无他事，为钱钻弄颠倒颠。我曰多钱终多累，画破钱世别有天。”

词的下款注：道光甲辰冬纪常愍士并画。画中字：子曰富而

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郑绩所绘的《金钱图》题词与画配合 寓庄于谐 敦风劝世，图词并茂，主题独特，概括而通俗。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金钱世态，也表现了郑绩轻薄功名利禄的品格。

郑绩后来以卖字画为生，四处泛游，新会杜阮叱石岩下石壁上有其擘窠大书“一洗红尘”四个字，笔法苍劲雄浑。郑绩的字画，受到书坛画苑知名人士的赏识，因而驰名。上至官吏，下至平民，遇有喜庆贺屏寿幛，都以得他的字画为荣。郑绩所到之处，前来求书画的人，常挤满屋舍；而投赠报酬的钱银肉食，不可胜数。但是，他生性任侠，疏财仗义，乐善好施，以至常常四壁萧条，家无积储。中年，曾放弃卖字画生涯，转而经营盐业。因他操纵有术，进出居奇，不半载便获大利。贩盐三十余年，全无拖欠应缴的盐饷，而自己的盈利亦很可观。

咸丰七年（1857年）湖北省为筹军饷来广东招人捐官（官衔），无人响应。郑绩闻知此事，认为子民百姓受国家君主恩德，如今疆土有警，怎能坐视？于是，暗中变卖家产，捐输千金以为倡导。

同治五年（1866年）秋，大水困广州，积水难退，居民受害，当局计议疏浚“六脉渠”下水道，苦于费用无着落，迟迟未能动工。郑绩知道后，慨然带头出资千金，并亲自规划浚渠工程，排除水患。

同治八年（1869年），官方多次行文追征连阳地方“十万逋课”（即十万元欠税），有关人士束手无策。郑绩出于同情心，运用他的关系和影响力，四处张罗，飞函求援，不十日遂解连阳之困。

新会县衙的差役，向来横行霸道，城乡绅士亦不敢和他们抗争。当时，有郑氏族妇和堂嫂口角相争而自尽，知县令查访案情，以便办理。差役借机勒索，拆毁事主邻近房屋数间，把器具衣服

掠夺一空。郑绩率事主家人到县衙鸣冤。知县方观海，大为震怒，经查讯属实，严惩了这群差役，命令他们将抢掠的财物归还事主，罚赔修屋银 300 两。从此，县役的凶威有所收敛。

同治九年（1870 年）桥美乡莫、郑两姓发生械斗，双方各聚集近千人，炮火鏖战七日夜，死十余人，伤以百计。县官武弁无能制止，便派人到广州请郑绩回乡排解。郑绩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到械斗现场调解。他昂然慷慨陈词，说以利害，令众人感悟，即日停止械斗，相与和好，官民齐称其为“一代之雄”。

郑绩晚年，隐居广州越秀山南麓自营的别墅，园曰梦香，居曰梦幻楼，梦寄。

郑绩有不少书、诗、画作品留存于今：广州美术馆藏有他于清同治四年（1865 年）为画家邓大林《松园春燕图卷》所作的题识。新会市双水镇府藏有他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绘的《金钱图》。新会市博物馆藏有他于同治年间画的《山水人物图》、《晚汀渔竿图》等，《广东文物》记载过孙仲瑛藏有他画的《渔洋山人笠屐图》。

张其光传略

(1831.11—1896.12)

张锦标 (注1)

张其光，字信千，号奎垣，广东省新会县双水豪山乡人，生于清代道光十一年（1831年）农历七月初七日，自高祖以来数代在家乡务农。17岁随父传嵩就读于江门，在校好大楷书法，乐读兵书及传奇，又喜习剑法。双水塘河乡莫载遐在江门为名医，与其父传嵩至交，且又器重其光之为人，以女妻之（莫女未婚不幸去世）。俟后传嵩亦与世长辞。载遐屡授资使其光经商于琼、闽之间，并为娶继室陆氏。其光不谙经商之道，故益不得志。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陷大沽炮台，斯时沿海地方招募兵勇以固海防，其光以“大丈夫报国是其时也”，慨然立投效之志，载遐壮之，乃授资助以成行。其光率友好 200 人由江门出海至浙江投按察使段光清营中。

时浙江洋面海盗猖獗，专事抢掠，百姓无以安居。浙江巡抚王有龄委张其光回粤招募广艇，至浙江训练后成为水师广济右军炮艇，其光治水军之名缘此而起。咸丰十年（1860年）张其光奉命率广东船艇扼守富阳、淳安一带。次年，被围攻杭州的太平军击伤，浙东各县也被太平军占领。同治一年（1862年）春，伤愈回营，统率广济右军陆勇兼水师红单船。同治二年（1863年）率水陆兵勇攻太平军，收复绍兴、桐乡、萧山等县。赏戴兰翎，记名参将。同治三年（1864年）护理浙江巡抚蒋益澧，以浙江洋面海盗众多而添设红单师船 10 艘，檄张其光回粤招募。同治四年，

所募红单师船十号均为副将张其光管带。是年其光率勇捕斩海洋巨盗邱才清，委署乍浦协副将之职。同年 12 月 黄严镇总兵官刚安泰在主山外洋被盜艇围攻战歿，张其光在温州洋面获得警報冒雪回援，至爵溪与海盜相遇，其光飭所部先扼八岙口门，使海盜不得逃窜，乃督各哨围攻，当海盜死拒之时，众官兵皆奋力围剿，游击陈绍驾艇突进，掷火罐焚海盜之船，其光乘势跃进海盜首领梁彩船上，手刃数海盜落水，并斩盜首梁彩。此时众军兵拥上击沉海盜十余艇，毙海盜无数，又生擒盜首 50 余名，救出难民 180 余人。事后浙江巡抚入奏清廷，奉旨赏赐其光“振勇巴图鲁”封号，加总兵銜。同治 5 年（1866）10 月，闽浙总督左宗棠入奏：“现署乍浦协副将之留浙尽先补用副将张其光 36 岁，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人，由勇首历保以副将留浙尽先保用，委署今职，该员久经战阵缉捕勦奋，以之请补瑞安协副将亦堪胜任”。同治 6、7 年，其光先后破获盜案 30 余起，奏知朝廷以总兵记名简放。同治 8 年（1869 年）奉旨授衢州鎮总兵，后又调定海鎮总兵。同治 9 年 4 月署理浙江全省水陆提督。同年 11 月，奉调回任定海鎮总兵，仍带领水师红单船。查定海为浙江重镇，洋船出入交涉事多，而其光以至诚相示，因此华洋赖以安居。

同治 12 年（1873 年）闽浙总督李鹤年入奏，以张其光为水师将才，请调台湾鎮总鎮之职，为台湾挂印总兵官。^{〔注 2〕}按 挂印总兵官得专摺入奏，凡有一切军务可不必呈交总督、巡抚、提督等人代奏。当时台湾地险民悍，号称为难治之地区，其光抵任后，力禁军中恶习如摊扣、贴差诸弊端，军政因此焕然一新。当时嘉义、彰化地区伏匪如莽，充塞一方，官兵莫敢捕治。众匪仗恃地势巩固，并设荆棘围绕，各庄寨合共 80 余座。上年官兵攻 50 余日不能下，其光抵任后，招各将弁授方略，七日平之，台湾民众大为称颂。

同治 10 年（1871 年）11 月，琉球民船航海遇颶风，漂流至

台湾，为台湾牡丹社土人劫杀 50 余人，日本以琉球为其属国，藉词向清廷诘问。同治 13 年（1874 年）3 月，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率领海军至台湾，击败土人，并斩牡丹社首领，18 社等众相继降附，台东几至沦陷。清廷闻警，声明台湾为大清属地，不许外人擅讨，请日本撤兵。日本不听，且讹言欲取台湾西部。清廷知不能坐视，遂于同治 13 年 5 月 29 日，授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事务大臣，所有福建镇道官员，均归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

同治 13 年 8 月 1 日，鉴于澎湖协为台湾命脉，而防守虚弱，沈葆楨乃飭副将吴奇勋添募新兵一营，台湾镇总镇张其光派员赴上海购买大铁炮 10 尊，交付吴奇勋使用。其时台湾局势极为紧张，中日双方积极备战，各地将领，云集于台湾，8 月 2 日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抵台。8 月 25 日武毅军提督唐定奎率领洋枪队 6000 余人抵台湾，后又添 4000 余人，8 月 16 日钦差大臣沈葆楨命台湾道夏献纶督办宜兰等地方乡团。又派总兵张其光专责管理台南全境。10 月 28 日，张其光亲赴广东南澳会同南澳镇总兵官吴光亮就地招募广东土兵 2000 多人至台湾。此时其光驻军枋寮，分兵坚守各关隘，向福建、广东移居在台湾之庄民喻以大义，并选其精壮者训练成军，以壮军威。又安抚土人，使为己用，台清土人所居之地，多在山区，窟诡岩险，林深箐密，各社之顽梗土人，每狙伏于道口，杀害过路之人，犷悍异常，难以制服。其光见此情况，乃上言大府^{（注 3）}，请钦差大臣上奏清廷，请准抚番开路。顽固者陈兵以威镇，善良者导其归化。由此经历险阻，开诚抚谕。受抚之土人 60 余社，因此南路以通。

先是，其光率兵三营，调一部份与海防同知袁闻析，其光亲率一部开辟射寮卑南道，起自凤山县之射寮（今屏东县枋寮乡）经红泥咀、立里社、南昆仑、古阿仑、春望岩、大鸟万溪口、大猫里（今台东县大麻里乡）以达卑南，开辟路程共 214 公里。另所

部海防同知袁闻析于台南开辟 175 公里，是为南路；台中另由广东南澳镇总兵官吴光亮率兵三营，开辟路程计 265 公里是为中路；台北由福建提督罗大春率兵 13 营，开辟计程 205 里是为北路。光绪元年（1875 年）钦差大臣沈葆楨会同闽浙总督福建巡抚上奏，陈列台湾总兵官张其光之业绩，奉旨其光以提督简放赏穿黄马褂。

光绪二年（1876 年）10 月，台湾镇总兵张其光、台湾道员夏献纶二人均患重病，台湾军政大事无人主持。

光绪三年（1877 年）台湾南、北、中三路土人负险嗜杀，于光绪二年冬杀害台湾镇总兵张其光所部哨官把总谢受业及军士数名，而附近各乡村居民积年累月被当地土人杀害无数，因此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请派总兵张其光率精兵前往进剿。“台南之土人一贯结队袭击军兵，其枪械甚多，子弹如雨坠，查当地土人之枪械皆来自日本，日本人以枪械供给土人，阴谋挑拨，以达其制造混乱局面，藉此要挟清政府为其目的”。^{（注 4）}但芒山形势险恶，只有羊肠小道可登，其光率大军兵临芒山之下，虽亲冒矢石亦未能登山破敌，且腿部先为枪弹所伤。芒山群匪仗山势之险恶，负隅顽抗，故清廷于先多次进剿皆未能殄灭。事后其光使精干之军士扮为樵夫，储备干粮，分组先后登上芒山之四周，潜伏于密林之内，以便窥探敌军之隐蔽；继之择于雷电交加暴雨狂风之夜，其光率军乘暴风雨探索前进奇袭芒山，天将亮直扑险要，鼓角齐鸣，炮声震耳，芒山四周伏兵闻号突出，四面环攻，拔险破坚乃克山寨。此时叛者悔罪投诚，均可宽其既往，并解散狮头、龟纹等社之胁从者。光绪 3 年（1877 年）3 月 9 日，李鸿章为文华殿大学士，是为枢臣之首要。其光手书上禀，光绪 4 月（1878 年），得李鸿章复信：

“……承示台湾开山抚番各情形……现既有张镇一军航海飞渡，克日剿办，军威一振，谅能使群丑寒心。边氓效顺，即开垦各务，亦渐可经营布置……如以全力经理，不难取精用宏，雨生中丞颇著意在此……倘能久驻区划，渐臻成效，非惟东南数省之

利，亦天下大局之幸也……”。（注：录李鸿章之复信，可知道清廷与台湾之关系。）

张其光镇抚台湾数载，后因积受瘴毒，患病较深，遂调补福建省福定镇总兵。光绪 6 年（1880 年）清廷命浙江提督吴长庆帮办山东防务节制防军，浙江提督一职需调员暂代，张其光因奉命再署浙江提督。时值中俄边衅。自去年伊犁交涉失败后，俄人增兵伊犁，遣军舰游戈海上，声言决裂以为要挟，清廷为巩固沿海防务，命张其光总统全浙江水陆防务，节制水陆各镇。其光接任之后，充实军备，选择优秀官兵，并加筑沿海炮台，募勇士守之，勉励诸将士“上下一心，敌则不敢犯我寸土矣”。光绪 7 年（1881 年）春，出使俄国大臣曾纪泽与俄政府修改伊犁条约，海防于是解严，是年其光改调浙江温州镇总兵官。光绪 9 年（1883 年）安南王与法国订立法越新约，规定安南为法之保护国，非得法国许可，不得与他国交通。清廷以安南向为中国之藩属，使曾纪泽向法国抗议。光绪 10 年（1884 年）秋 7 月，清廷下诏向法国宣战，法军进攻福建，陷马尾炮台，进而攻台湾、浙江等地。温州乃海防重镇，总兵张其光力筹守御之策，如过去防俄之不敢稍懈，更添筑龙湾炮台，官库银不足，遂自捐俸 2000 两以助其成。后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大败法舰于镇海，敌势已挫，浙江海防益固。光绪 11 年（1885 年）3 月，中法和议成，又逢皇太后五旬寿庆，赐其光母阮氏太夫人用宝御书“萱荫延芳”匾额，加赏玉如意、蟒缎等物。初，其光之弟蓉光在浙江统领水师船巡洋积功至副将，因母亲阮氏太夫人年高，辞职回乡奉母。后蓉光在家乡去世，其光乃奏请朝廷，获准开缺回籍两年，直至阮氏太夫人去世服满。光绪 19 年（1893 年）特授温州镇总兵。同年 8 月军机大臣翁同龢荐张其光于光绪皇帝，蒙光绪皇帝召见两次，光绪 20 年（1894 年）6 月实授浙江全省水陆提督。是年皇太后六旬大寿，赐其光用宝御书“寿”字一方、大卷八丝缎二疋。

光绪 20 年 5 月朝鲜京学党内乱，清廷派兵助剿，而日本亦藉此派兵抵朝鲜。6 月日本兵入朝鲜王宫，幽禁朝鲜国王，并声言改革朝鲜内政；此时日本在大孤山洋面袭击清廷海军，又于牙山袭击清廷陆军。秋 7 月，清廷宣布向日本开战，再命张其光总统沿海水陆防务，其光受命，出驻镇海，严密布防，招募新军数营，日加训练，口讲指授三月悉成劲旅。8 月，清军败于平壤。总兵左宝贵殉国，海军与日本战于大东沟外，管带邓世昌殉国。9 月，日军攻辽东，陷大连、安东诸城，10 月，日军再陷凤凰城。有流言传：“日本海军将侵至闽浙”。浙江人心震恐，居民多携家徙沪，其光坚守海防不为所动，镇定应变，尝缉获间谍日本僧人两名，解省讯办。由于军令森严，海防巩固，民众之心稍安。光绪 21 年（1895 年）春，日军攻陷刘公岛，清海军全部被掳，清廷派李鸿章与日本议和。

光绪 22 年（1896 年）^{（注 5）}冬，其光亲临招宝山阅操，历时月余，时风雪交加，于是感寒成疾，又因积劳过甚，牵动旧伤呕血数升，于 12 月 19 日瘁于海防任内，终年 66 岁。闽浙总督边宝泉奏达朝廷，疏陈生平业绩，奉旨依提督例赐恤，诸子荫叙有差。

注：（1）作者张锦标是张其光之孙。

（2）台湾是福建省之重镇，由雍正 11 年（1733 年）议定按照边防之例挂印总兵官给方印。至光绪 13 年（1887 年）台湾设省，由此时起，撤销挂印总兵官，以刘铭传为台湾巡抚。

（3）原文见兵部主政张焯奎所记浙江提督张军门行状，但早年有些书刊将大府二字解作知府，此是误会，知府是一府行政长官，又名府台，其职位在总镇与道台之下。但大府之府字是解作官署，即今天所称行政机关，如县府、市府、省府等称谓。大府之解释应为最大行政官署最高长官。当时在台湾是指钦差大臣沈葆楨。因为钦差所驻之地方，凡是一切奏章，指定由钦差代奏。

（4）见北京钟德祥御史给张其光之书信。

（5）县志载张其光于 1895 年病逝。

谭 镡 传 略

(1863—1924)

文史研究组

谭镡先生字康斋，号仲鸾，县之环城区南坦乡人。为我县学者、教育家、考古家，县中学校创办人及首任校长，《新会乡土志》总编辑员。

谭年弱冠中秀才，以学业优良得与其表弟梁启超先后进广州学海堂专习经、史。光绪 15 年（1889）己丑，中恩科第九名举人。时康有为以《公羊》学鸣于时，力倡今文经学以新士风，锐进之士，闻风景从。庚寅间，谭与启超乃从而受学。次年赴京试于礼部不第，乙未再随康、梁入京会试，是科康有为中进士，谭仍落第，参与康、梁发动的著名“公车上书”的“变法维新”爱国活动。至光绪 30 年（1904）再欲赴京会试（最后一次科举），苦无川资。七堡澳门某富商欲为其子猎取功名，愿出全部费用并许诺考中时赏以巨金，求谭兼卷（此是当时科场作弊之通病），许之，结果富商之子考中进士点翰林，谭则因文章中引用德相俾斯麦的一句名言，以其头脑太新而摒弃。

谭出身寒微，家累颇重，乙未以还，居乡之时日较多，当梁启超《变法通议》在《时务报》发表后，谭即起而响应，与邑中开明士绅、举人黄震川等计划在本邑创办学堂，但为顽固的当权者所反对，未能实现。

光绪 30 年（1904）本县奉命设立“阖邑学务公所”县知事派谭为筹办“官立初级师范学堂”委员，以培养中学师资。光绪

31 年(1905)春开学,谭被聘为该学堂监督。招收师范班一期,两年毕业。毕业后量才分派,成绩优良者被聘为县中学教师。不久,师范学堂改名为“官立中学堂”(今新会一中前身),为县之第一间最高学府,谭是时亦转任为“官立中学堂”监督。

民国肇建,教育有所改革。民国元年(1912年),官立中学堂易名为县立中学校,监督改称校长。谭既是该校创办人,德高望重,为县中宿儒,亦被任该校首任校长,至1924年去世止,在任20年,计招收师范一班、中学十八班。其在任期间,每年招考新生,必亲临监考及阅卷,甄别选拔,作育人才千数以上,不少为国家及地方知名之士。

谭镡治教有几个特点。首先是“廉明”:县里每年拨足经费之外,还令县书院划出部分田产给师范学堂收租以补收入,另向学生收学费,因此师范学堂经济很是充裕。谭把所有可动用的收入都用于高薪聘请教师和增添教学设施,而自己则除按例领取工资外,分文不沾。首任一中教师施雨崖先生在1934年出版的一中学生自治会刊物《一中学生》上撰文写道:“……谭校长仲鸾在职时,学生常六、七班,学费不及今之丰,未尝患贫……省吏以谭校长学问文章为学生信服,学校成绩又为全省各校之冠,故能久任不迁,任内尝无亏空;继任为谈云笙(日本留学归来,笔者注),仅一年辞职,亏款二千余金。”对比极为鲜明。

第二特点是极重教师素质:民初,广州已有高等师范造就中学师资,但开办之初高师毕业生不敷应用。文科教师尚能从秀才、举人中挑选,而理科、外语教师就含糊不得,谭镡不惜出高薪聘请留学生,如英语科聘香港书院或曾留学美国的港籍人士,因此教师素质堪称一流。约1921年间,曾聘请一位留日归来的林卓南为教师,他讲授理化生物时,经常引唯物史观学说,结合学科行讲解,使学生获得新思想、新观点。

第三是管教严格。初进校的新生,无论原来怎样调皮活泼,入

学伊始，都被学校严肃、紧张的学风所镇慑而不敢逆行。校规凡寄宿的学生每二人配给一间布置完善的学习间，不寄宿食的，四人配一间。学生除每天到课堂上课外，其余时间统统要回到自己的学习间里自修，功课习题作业，布置甚多，不容学生松懈；逢星期日寄宿生可回家一转，但下午 4 时前必须回校报到，违纪者会被“记过”，满三个“大过”就被开除学籍。由于学风很严，令家长放心，不少家长为求子弟上进，即使住地离校不远，也一定要求学生入校寄宿。

谭镡抓学风校纪严近于苛，而本人却是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实事求是、不拘一格的长者。后来当过县督学、国民党县党部秘书、县参议员的林瑞尧先生，生前曾向一些校友讲述谭镡校长的一件小事，颇能证其为人：1922 年林瑞尧去县中学参加入学试，适逢十年一度的会城帝临堂庙会，舞狮巡游，途为之塞。林挤在人群中观看至游人散，匆匆赶到试场已迟到近一个小时，守在门口的监考老师不准瑞尧入场，急得他大哭起来，谭校长此时出来，面带笑容地问明原委，破格准其入场，并吩咐监考教师准予延时交卷。林瑞尧当时就想下跪谢恩。

在谭镡管治之下的新会县立中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对谭校长深怀眷恋之情，部分学生在他逝世四年后即 1928 年，自发集资在校园东侧马山脚下（今博物馆北展厅北边墙根位置）建了一座纪念亭，题为“仲鸾亭”以誌纪念。

谭受任初级师范学堂的同时，又奉命任《新会乡土志》总编辑，并遴选黎昀（璧援）、林骏（灿予）为编辑员，施树森（雨崖）等 22 人为调查员，全书按部颁例目分 15 篇。书成于光绪 34 年（1908）六月，同年七月知县蔡尧牺奉提学司批示表扬，略谓“申缴《乡土志》二部，考订精审，具见编辑调查各员任事之能，以视各属所缴，侔乎远矣。”而该志注意到搜集经济资料，在当时其眼光亦是独到的。

谭早受康、梁影响，对古今中外诸书多所阅览，其家中收藏书籍文物，数量之多，亦为邑人所罕见。黎昀《谭镡所藏古物歌》谓“先生插架三万编，嗜好日与古为缘。读书考证及名物，事事目验佐言诠。搜罗古迹渐富有，簞笥储腹同便便。”其收藏之丰，于此可见。民国五年（1916年）当其在广州任广州文庙奉祀官时，市郊东山土名“龟冈”的山冈，发现墓葬出土文物颇多，有关部门请谭鉴别，认为是南越王赵佗之墓，其中有三块璧玉，其价值因而立即“价若连城”。

1913年，康门弟子陈焕章、麦孟华等人发起组织孔教会，10月，孔教会在上海成立，并发行《孔教会杂志》。谭被推为“广东孔教会”会长，同时又充广雅书院士绅，日与省中名宿相往还。著有《古钱谱》、《冈州考》等书。他还曾受聘为广东通志局员。《冈州考》是继《乡土志》中所提出新会县属问题而作的。其观点与阮《通志》、林《县志》有所相左。惜其著作，均未付梓，只在《乡土志》见其大略而已。

谭先生于1924年春，回乡养病去世，终年62岁。其门人构筑纪念台于中学校园左侧马山，泐石纪念。（本文由文史研究组根据何卓坚、何家骏、陈占标稿整理）

张 荫 棠 传 略

(1864—1935)^注

张 锦 标

张荫棠，字朝弼，号少卿，又号憩伯。广东新会县双水镇豪山乡人。生于清同治三年（即 1864 年）清代浙江海防水师总兵官张蓉光之长子。曾以灼文为名中举。先在京候补，其后任内阁中书、驻日本参赞、驻美国参赞。光绪 24 年（1898 年）4 月至 25 年（1899 年）9 月，任驻美国三藩市总领事。光绪 30 年 英国与藏官议订印藏私约十款于春丕。但西藏为我国领土，藏官无直接议约权，驻藏大臣有泰，以未得外务部同意不敢划押，于是英国照会清政府，请派员议约。是年 9 月，唐绍仪受命为议约全权大臣，率左、右参赞张荫棠、梁士诒等人，于光绪 31 年（1905 年）1 月抵印度。绍仪与英国议约专使费利夏所议不谐，讫无成议。外务部奏请召绍仪与参赞梁士诒回北京，留参赞张荫棠于印度。光绪 32 年（1906 年）1 月 23 日，张荫棠以电报奏清政府，提出治藏新政策。该电文称：“英人经营西藏已非一日，耗费不下千万，阴谋百出，令人有不可思议者，前年乘日俄开战，知俄势力东西不能相顾，又趁我国多事，于是有侵藏之举。此次又诱班禅来印，待以王礼，印报谓英人深知班禅与达赖不睦，劝令班禅请英保护，拒绝达赖，以图独立，惟班禅年少质愚，虽无远志，难保不为所动，然班禅岂足以自立图存者，是即日本扶助高丽之故技耳！……窃思藏地东西七千余里，南北五千余里，为川、滇、秦、陇四省

屏蔽，设有疏虞，不独四省防无虚日，其关系大局实有不堪设想者。且各省办理边防，均有重兵镇守，西藏密迩印度，边患交涉与行省不同，其危险情形尤与上年不同，诚如当轴所谓整顿西藏有刻不容缓之势矣。……拟请奏简贵胄，总制全藏，并派知兵大员，统精兵二万人，迅速由川入藏，分驻要隘，以救目前之急，俟大局稳定，陆续添练番兵，再行逐年递减汉兵额数，此后常年驻藏汉兵约需五千，即足以资弹压。一面将达赖、班禅优加封号，尊为藏中教主，所有内政外交以及一切新政，由国家简员经理，恩威并用，使藏人实信国家权力，深有可恃，则倚仗之心益坚，又何敢再盟异志？况英人亦视我在藏兵力之强弱，能否治藏以为因应，我能自治，外人无隙可乘，自泯觊觎之心。”清政府采纳张荫棠治藏新政策，于同年 4 月 14 日降旨特派张荫棠由印赴藏，赏给布政使副都统衔为钦差西藏查办事件大臣。张荫棠于 7 月 22 日经大吉岭入藏，10 月 12 日到达拉萨，其时达赖已外逃，其余全体藏官列队迎接，藏民万多人夹道焚香顶礼欢呼，期望特派钦差查处办理“西藏事件”。

关于西藏事件：光绪 30 年 6 月，达赖喇嘛（即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受俄国引诱仇英从俄，英俄因争夺西藏利益而互相寻衅，达赖不听驻藏大臣裕钢之劝告，派遣乍丫土兵助俄攻英。乍丫兵最无军纪，抵拉萨后，先围攻驻藏大臣裕钢之衙署，杀死数十人，经藏官弹压始止。与英军作战，甫临阵即作鸟兽散。清廷命有泰代裕钢为驻藏大臣。英军至江孜屡请有泰往议事，有泰避而不往，英军即长驱直进占据拉萨，达赖外逃至青海、甘肃、外蒙等地。有泰以达赖误国且擅离所在地，上奏清廷请革其名号。张荫棠抵藏后，查明有泰与驻藏官员之劣迹恶行，于光绪 32 年 11 月 18 日奏请弹劾（注 奏章从略）11 月 29 日 清廷颁旨将有泰等人革职处分。据张荫棠奏摺内称：“臣此次奉命入藏，全藏极为震

动，屏息以观我措施，以为臣系奉特旨查办藏事人员，与寻常驻藏者不同……”。张荫棠于光绪 33 年（1907 年）1 月 13 日致外务部电文，提出新治藏政策大纲，内称：“应亟筹收回政权，练兵兴学，以图抵制，而杜借口”。电文中详尽开列治藏方略共 19 条。

张荫棠这份上奏电文的内容，经清政府采纳成为治藏新纲领。

3 月 10 日，张荫棠根据治藏新政策，命令噶厦成立交涉、督练、财政、盐茶、路矿、工商、学务、农务、巡警等九个局，作为执行新政之机构。又颁发《训俗浅言》和《藏俗改良》两种小册子，译成藏文散发各地。

经清政府批准治藏之新政策，是有一定程度变法维新之思想，如提出发展西藏农、工、商业，开发矿产，便利交通，发展教育，外办报纸、银行等。各项措施如能实现，对西藏人民是极其有利的。

张荫棠在查办事件中，首先参革不法官员，其次是励精图治，实行治藏新政策；第三是处理达赖与班禅即前藏与后藏之间关系。张荫棠驻藏期间，班禅曾送上一函，提出前后藏分治要求。荫棠在回函中，一方面鲜明地指出班禅不应为康熙年间旧事纠缠不已，须防小人离间。一方面又善意提醒班禅当念前后藏是唇齿相依、同种同教，不宜各分界域。劝喻班禅“现外番屡进后藏，日图并吞后藏，以通阿富汗，喀什米尔等处，其诡计奸谋，比前藏尤为危险，此时唐古忒人等同心协力，尚恐难御外侮，不应同室操戈，以中外番之计”。光绪 33 年（1907 年）上奏清廷内称：“近年达赖与班禅又互相猜贰，班禅自到印京见英储后，隐恃英援，欲与达赖争权，英员时至后藏，煽惑班禅，又派班禅为印度夺垫地方佛教总管，百端笼络，冀遂其鬼蜮之谋”。又另一奏摺内称：“棠奉命入藏，道经江孜，班禅差札萨克来迎，谈次微露班禅有欲代达赖之意。及抵拉萨，以前情告知藏王，当时噶布伦等颇为警慌”。同